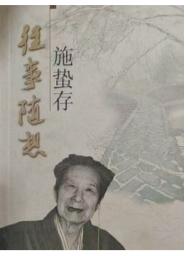




怀念施蛰存先生

耿传明



今年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施蛰存先生出生于1905年，辞世于2003年。施蛰存是现代文坛上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学者。他曾笑言，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与编辑，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编译，北窗是金石碑帖考索。一个人一生能在其中一两个领域作出点成绩已非常难得，更难得的是他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这说明施先生确有其过人之处。关于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现在已有不少的研究者，无需我来多言了，我在此只谈我个人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印象：那就是他为人的率真和坦荡。他的一生虽屡经颠簸，但棱角依然；虽饱尝直言之苦，但他到老仍能保持一片率真纯净的童心，这就更为难得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听我的导师田仲济先生讲过施蛰存先生这样一则逸事：上世纪60年代，有个大学组织师生合作编写了一本《现代作家传略》。施先生作为30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入选其中。那是一个极“左”思维不断升级加码的时代，上世纪30年代就因为《庄子》和《文选》问题与鲁迅展开过争论、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的施先生自然无法指望得到公正的评价，但这本书开言就把施先生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让当事人施先生无法接受。这样的“传略”还寄给了施先生本人审阅。施先生很快就把审阅的“传略”寄了回来，他对“传略”只字未改，只在“反动文人”四个字上画了个圈。此事很可見施先生的个性：沉默但并不屈服，退让但并不怯懦。即使成了右派，他也没有被那个时代的高压压垮，仍保留了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平心而论，把施先生说成是“反动文人”，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无法苟同：上世纪30年代，鲁迅悼念左联五烈士的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在几家杂志都不敢发表的情况下，由施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首先发表的，这在当时是要冒杂志被封、甚至编辑坐牢的风险的。所以你可以说施先生没有积极投身革命，但说他是“反动文人”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他自己讲过年轻时也曾向往革命，但“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之

后，他觉得自己不具备干革命的素质，且因为是独子，考虑到家庭责任，才退出革命，但绝反对革命。

1987年春，我还在山东师范大学读硕士，硕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外出游学，曾专程去上海拜访过施蛰存先生。那时他已年过八旬，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座小楼里，虽然刚刚因病做过手术，但身体恢复得不错，精神更好，只是有些耳背，与人谈话要借助助听器，或者手写。那次我主要向他请教了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一些情况，包括当时的文学氛围、流行思潮、社会环境，等等。施先生以他过来人的亲身感受给我做了精彩、详尽的解答，令我获益匪浅。他鼓励青年人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要了解世界文化、文学的最新动态，并深以当时国内文化界与西方交流的一些不便为憾事。他在30年代的上海，可以随时买到西方新出的各类书籍，可在当时的外文书店里，能看到的大多只是一些学外语的教材。对于30年代他与鲁迅的那场笔墨官司，他不愿多作解释，任凭后人评说。但他指出鲁迅也并不总是在一本正经地讲绝对正确的话，他也是有他率性、调侃、姑妄言之的一面的。窃以为，启蒙的真谛在于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无论是古代圣人还是现代圣人，都不能取代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所以重要的不是谁说的，而是其说的是否为真理，这才是启蒙的真精神所在。

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把文学看得过于“严肃”“神圣化”的倾向，施先生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在《“文”而不“学”》一文中，他指出，“无论在作家或读者这方面，文学始终不是种需要深邃研究的专门学问”。把文学看作改造人生的利器等的结果是：人们把看新文学书看作一种“人生指南”一类的东西、一种恭聆教诲的事，导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新文学’是为了消遣，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文学书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这就使得“新文学书”对于这些读者，无形中已取得了“圣经”、公民教科书或者政治学教科书的地位。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新文学遂真的俨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多数看小说听戏的朋友不敢接触新文学的卷帙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新文学与普通

读者脱离开来，“我们常常听见嗜好踢足球的学生尊敬而又轻蔑地称他的看新文学小说的同学为‘文学家’，可是他自己呢？当然也看小说，但是张恨水的作品。他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只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过大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高，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

而另一种作家把文学看得过于“严肃”“神圣化”的结果是：“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可以是个教主，他可以是个大元帅，他可以是个有权威的时评家，他可以是个独裁者（dictator，发号施令者），他可以是个议员。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变成了他的小说。”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施先生是有他的先见之明的，这种将文学看得过分严肃，过于政治化、道德化的倾向，最后会导致断送“文学”自身的结果，特殊时期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也正是这种文学观的极端形态。

与某些自视甚高、自信满满的现代文人不同，施先生对在其时代出尽风头、饱受赞誉的文学家持一种低调的反省态度，他将古代文人与现代文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是统摄六义的。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只能写的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施先生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给现代文人发烧的脑袋上泼了盆冷水，有助于使其清醒起来。现代一些文人多是凭着个人的天赋、才情、欲望、本能来写作，无学以实之，无道以辅之，只是“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的自我表现而已，结果时过境迁，留下的多是浮华。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古人不同，他们即刻拥有甚或透支了社会给予他们的声名和地位，而给文学和历史留下的则是废墟和荒漠。施先生当时写这篇文章当然是有感而发且是由一些具体的事例引发的，现代文人与传统士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王统照说这是茶与茶渣的区别，虽有点绝对，但也值得深思。

总之，与施先生谈话和读施先生的书，会随时随处感受到一位源于深厚学养的智者无拘无束、无遮无拦的自由思想的魅力。古人说“处世无奇但率真”，我觉得这句话也正道出了施先生为人、为学的精髓。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施先生的终身所为都是他所乐之者的“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所以不管境遇如何，他始终保全了一颗纯净的童心，这在那个变幻无常的动荡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相信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以及我的上一代人，大都从课本上读到过《小英雄雨来》这篇文章。

在我少年时代的音乐课上，《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这三首歌曲，使我倍觉其带有浓烈的抒情色彩，一直留在我金色的童年记忆里。后来才知道，它们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并且和《小英雄雨来》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就是作家、诗人和画家管桦。

《小英雄雨来》的写作稍早，它有一个修订和扩充的漫长过程，算起来，这篇小说和这三首歌曲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对祖国的讴歌与赞美，无论是田野抑或节日，以及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那都是不同时空里的祖国，而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小英雄雨来》更是如此。

管桦原名鲍化普，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女过庄村，他的父亲鲍子普是抗战烈士，因参加著名的冀东暴动，而将家眷送至天津以避战火，管桦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就读中学。管桦1940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曾在冀东区《救国报》担任随军记者，也曾在冀东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文艺队和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供职，活跃在抗日文艺战线。1948年，管桦离开军队到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得到他的同事、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支持和鼓励。《雨来没有死》首刊于1948年3月的《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

同样是在1948年，《人民日报》由晋察冀地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地区的《人民日报》合并创刊，1949年3月又随党中央迁入北平，此后正式成为党中央机关报。《雨来没有死》的修订版部分片段曾在1949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为什么要重新刊发呢？其实这个日子就是答案。4月4日是当时中国的儿童节，在这一天重新刊发这篇小说，可见它作为儿童文学的质量水平是达到相当高度而被认可的，它也因此在全国范围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管桦在《〈小英雄雨来〉的命运》一文中称，他在1955年完成了这部小说的中篇版。在此之前，1951年4月在三联书店也已出版了它的短篇单行本，当时小说题目已经从《雨来没有死》改成《小英雄雨来》，内容共有19节。小说的中篇版最初版本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我读到的是1984年11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管桦作品选》中收录的这篇作品，它修订于1962年11月，那么这应该是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的版本，它已经扩充到共计41节。扩充后的作品篇幅成为中篇小说，但仍然是原来的样式，由很小的章节组合而成，每一节都有一个小标题。从短篇到中篇，作者加入了更多的故事，使其成为一篇集锦式的小说，它可以连缀成章，也可以单独存在，连缀时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也许因为这些故事相对都是独立的，所以作者选择了一个开放的结尾，最后一节题为《小英雄的故事多着呢》，是说雨来在战斗中负伤以后，在医院里养了一个多月即参加了游击队，此后还有很多精彩的战斗故事下次再讲。按照这个思路，雨来的故事还可以无限接续和添加，因为如雨来这样的小英雄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层出不穷的。

很多人有一个执拗的逻辑，就是阅读文学作品时喜欢追寻人物的原型，那么雨来是谁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管桦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一位解放军同志在天津做报告，说他就是雨来，因为书中所写的情节和他所经历的完全相同。而管桦也说，在那个时候，夏天下河洗澡、摸鱼，冬天在冰上擦滑儿、站岗、放哨、送信、上夜校，这是当时大多数儿童团员都有过的经历。那么，小英雄雨来其实应该是包括管桦本人在内的无数儿童团员的普遍集合与高度浓缩。

《小英雄雨来》这篇小说是以童年视角切入的抗战文学，作者笔下还乡河畔芦花村里以雨来为代表的一群乡村少年，他们眷恋故土，保卫家园，抵御外侮，痛击日寇，通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文中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写出了一颗真挚的初心，也写到了还乡河两岸秀丽的风景。

小说利用雨来上夜校等情境，在黑板上、在书本上，都反复提及这样两行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也是以儿童的视角表达爱国情怀。小说《小英雄雨来》以景寓情，许多景物描写都增加了抒情色彩，它构建了情景交融的战争美学，也提出了一个芦花村的地理概念，即芦花飘荡中的一个小村庄。

管桦的文字有着浓浓的乡情。《小英雄雨来》诞生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之时，作者时刻不忘描绘与讴歌家乡、家乡的土地与河流，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祖国。



小英雄雨来

最温柔的闹钟

吴昆



“该起了。”

母亲的声音总裹着水汽，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西瓜，凉丝丝的甜。她从不掀我的被子，只是把叠好的校服搭在床尾，指尖偶尔扫过我的脚背，像春风拂过新抽的柳丝。那时我总赖着不起，听她在灶台前忙碌，铁锅与铁铲碰撞叮当声，混着窗外卖豆浆的吆喝声，在晨光里“织”成一张暖融融的网。

上中学时要上早自习，冬日的天总是黑沉沉的。母亲的闹钟定在五点钟，比我早半小时。我在被窝里听她摸黑儿穿衣服，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的响声，像春蚕在啃桑叶。等我被熟香勾起来时，总能看见她站在灶台前，围裙上被点点白汽“沾湿”，头发被蒸腾的热气熏得微湿。“快吃，”她把剥好的鸡蛋塞进我手里，指尖带着刚揉过面团的面粉，“今天路滑，我送你去车站。”

后来在外地上学，冬天总爱赖床。母亲打来电话时，我常常还埋在被子里。“太阳都晒屁股了。”她在那头笑，背景里有炒菜的滋啦声，“我刚把给你晒的被子收进来，棉絮软乎乎的，像你小时候盖的那床。”我鼻子忽然一酸，仿佛看见她踮着脚够阳台上的竹竿，晨露打湿了她的袖口。挂了电话再也躺不住，起身时发现阳光正好落在书桌上，像她铺在我床头的暖阳。

工作后住得远，难得回家。那天加班到深夜，手机里跳出母亲发来的信息：“明早想吃什么？我四点起来包馄饨。”我回她不用太早，她却像没看见似的，第二天清晨六点就发来视频。镜头里她系着蓝布围裙，站在晨光里擀面皮，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出规律的咚咚声。我忽然发现，那些曾觉得琐碎的声响，原来都藏着温柔的刻度。

上周出差，赶早班机。凌晨4点被手机铃声振醒，是母亲的短信：“我刚醒，听见窗外的鸟叫了，你那边天亮了吗？”我望着舷窗外墨蓝的天空，想起无数个被她唤醒的清晨。她从不用刺耳的铃声，只用粥香、脚步声、絮语声做指针，在岁月里轻轻转动，把每个平凡的日子，都调成了最温柔的时刻。

飞机起飞时，晨光正漫过云层。我仿佛又听见门帘哗啦作响，看见她站在晨光里，围裙上“沾”着白汽，笑着说：“该起了。”

这声音穿过岁月风霜，依然带着刚出锅的温度，像她从未改变的守候，在时光里永远准时。

晚饭后在院角纳凉，风里忽然浮起一丝清冽，像谁在盛夏的热汤里撒了把新碾的薄荷。仰头时，一片梧桐叶正打着旋儿往下落，叶尖还沾着半滴未干的夕阳，落在我脚边，发出极轻的“噗”声——想想，原来是过了立秋了。

古人说“一叶落知天下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也。”这“揪敛”二字极妙，像老茶客收了茶盏，像书生合上了线装书，天

地忽然就收敛了锋芒。记得小时候跟奶奶晒秋，她总指着檐下竹匾说：“你瞧这南瓜，立秋前还青生生的，过了立秋就该搬甜点儿了。”那时不懂，如今方知，原来秋的第一片叶，是天地递来的信笺，写着“万物该收”的密语。

古人对秋的信物最是敏感。据《礼祀·月令》记载，在周代，立秋那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铠甲映着秋阳，倒像是给大地别上了枚金簪。汉代民间则多煮青豆、拌茄子，谓之“啃秋”。《津门杂记·岁时风俗》记载：“立秋之日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借瓜果祛体内暑气，防秋燥，久之成俗。“咬秋”寓意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我曾在故宫旧档里见过一幅《立秋图》，画中孩童举着带藤的葫芦跑过青石板，身后老妪正往瓦罐里装新晒的梅干，连风都裹着蜜的甜。

去年此时，读到苏轼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

是橙黄橘绿时”，只当是诗人的浪漫；今年再看院角的桂树，才懂他说的原是“蓄势”的智慧。“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从不是割裂的剧场，而是生命的圆舞曲——春种时埋下的希望，在夏长里抽枝拔节，到立秋这天，忽然就显了轮廓。就像奶奶晒的梅干，晒的是夏日的阳光，藏的是秋日的回甘。

民间有句老话：“立了秋，把扇丢。”可我偏不爱听这“丢”字。前日在博物馆见到一件宋代团扇，绢面画着残荷，题款是“秋意虽浓，余韵犹存”。忽然明白，古人的“揪敛”，原是要我们学会“收”与“藏”的辩证智慧。就像杨万里写的“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秋不是终结，是另一种开始——稻穗弯下腰，是为了让谷粒更饱满；梧桐叶飘落，是为了让根系更深厚。

暮色渐浓时，奶奶端来一碗绿豆百合汤，

暮色渐浓时，奶奶端来一碗绿豆百合汤，